

當演算法重新定義「常識」

AI時代民主社會如何守護公共真實

◎ 王崢[1]

1776年，英國思想家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常識》（Common Sense）中寫下一句至今仍值得警惕的話：「長久習慣於不思考某件事情是錯誤的，會使它表面上看起來像是正確的。」（"A long habit of not thinking a thing wrong gives it a superficial appearance of being right."）兩百多年後，人類面對另一種問題：當演算法開始參與塑造我們所看到的世界時，誰正在決定什麼會成為新的「常識」？

1 王崢，武漢人，瑤族。現居新加坡。獨立中文筆會會員。2020年獲「汪國真詩歌獎」，2023年獲臺灣第四屆「羅葉文學獎」小說獎，新加坡「新華青年文學獎」詩歌獎、新加坡2024年度「早報金獎」暨小說組第一名，另獲香港第四屆「紫荊花詩獎」全球二等獎。中文詩歌、小說作品散見於「青島文學」「青春」「青年文學家」，臺灣「台客詩刊」「葡萄園」「中華日報」副刊，「自由時報」副刊及香港「聲韻詩刊」「虛詞」及「香港文學」。英文詩歌散見於「Queer Southeast Asia」「Malaysia Indie Fiction」「Woman」「The Asian CHA」「Voice &Verse」雜誌等。

AI 帶來的挑戰：合成客觀性、合成創造力、合成再敘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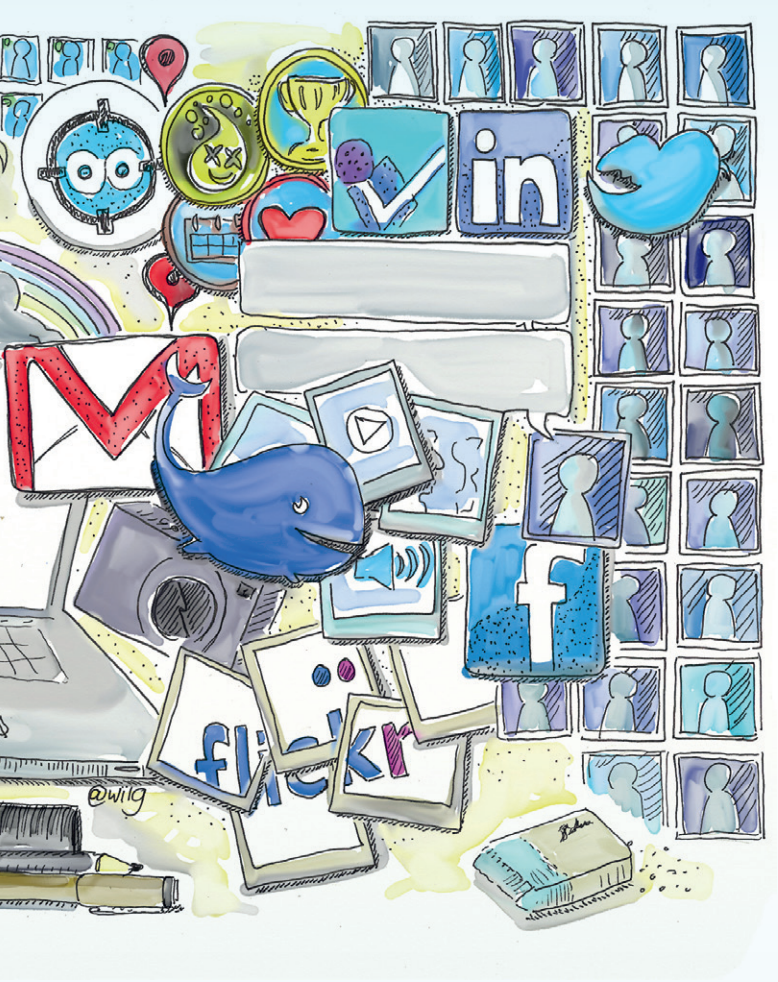
人工智慧最令人擔憂之處，並不只是它能生成假訊息，而是它能讓某些敘事以更大量、更自然、更貼近不同群體心理的方式進入公共空間。討論AI與資訊戰時，人們通常首先想到深偽技術（deepfake）或AI生成假訊息。然而，更深層的問題在於，AI正在改變公共討論的結構。首先，AI正在形成一種「合成客觀性」（synthetic objectivity）。AI最大的說服力，來自它看起來不像一個有立場的人，而是以平靜、完整、理性的語氣回答問題，彷彿站在所有立場之外，是一個超驗於所有意識形態的宇宙智慧。但任何大型語言模型都不是從真空中誕生，它受到訓練資料、語言環境、企業政策與政治文化影響。AI並不存在一個完全中立的普世視角。不同語言與資料環境中的AI，可能呈現不同的偏向；AI看似消除了人的偏見，實際上可能只是將偏見轉化為更難察覺的系統性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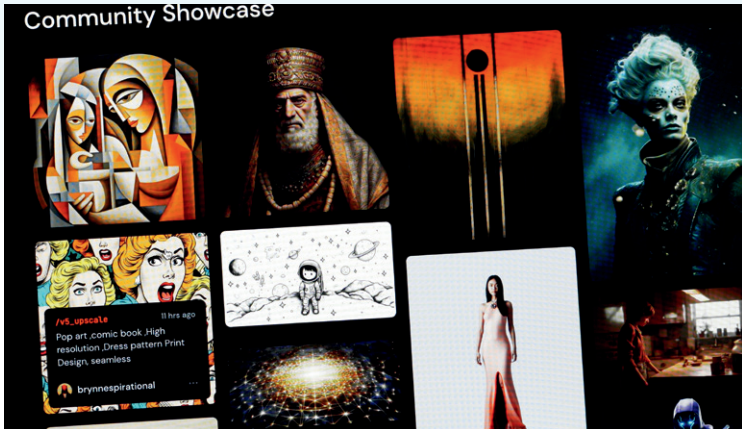


社交網路軟體的崛起，平台如Facebook、Instagram和Twitter成為迷因的主要傳播管道，使用者通過轉發、按讚和分享使其在短時間內迅速傳播。Photo Credit: Wilgengebroed,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32748496



其次，AI正在形成「合成創造力」（synthetic creativity）。生成式AI大幅降低文字、圖像、影片與迷因（meme）的生產成本，使資訊戰第一次具備近乎工業化的內容生產能力。Limor Shifman在《數字文化中的迷因》（Memes in Digital Culture ）中指出，迷因透過模仿、變形與傳播形成新的公共





生成式AI大幅降低文字、圖像、影片與迷因（meme）的生產成本。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表達方式；Crystal Abidin對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網路文化的研究也指出，迷因可以成為政治溝通與身分表達的重要場域。AI的出現，使迷因不只是網路文化現象，也可能成為大規模敘事競爭的工具。

然而，比生成大量內容更值得警惕的，是AI帶來的「合成再敘事」（synthetic reframing）。AI最危險的地方，不一定是讓人相信完全虛假的事件，而是讓社會開始討論一個被重新包裝過的問題。例如涉及海外華人歷史記憶的文化事件中，某些討論容易從政治與歷史問題轉移到語言與文化問題。以最近大火的潮語電影《阿嬤的情書》為例，原本涉及複雜的身分、歷史與地緣政治背景，但在資訊流動過程中，可能被無意或刻意簡化為「方言與華語之爭」、「傳統與現代之爭」，竟成最近新加坡國會的討論重點。語言保存固然重要，但當政治性的問題被



華語電影《給阿嬤的情書》涉及海外華人歷史記憶的複雜身分與地緣政治背景，某些討論容易從政治與歷史問題刻意被簡化為語言與文化問題。Photo Credit: Shwangtianyuan,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194872962



民主最危險的時刻，往往不是人民被迫接受謊言，而是人民逐漸失去懷疑的能力。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重新包裝成單純文化問題時，真正需要討論的內容可能因此被遮蔽，而政治企圖則可能以退為進，成為特洛伊木馬。

這種「滑坡式轉移」（sliding slope）同樣出現在國際衝突中。以巴戰爭和美伊衝突期間，各方大量使用AI生成圖片、影片與迷因塑造情緒敘事。在足球領域，也曾出現利用AI生成內容，將梅西與哭牆等高度政治化符號連結，暗示其支持某一政治立場，卻忽略球員與體育組織過去參與兒童足球教育、人道援助等其他行動。這類內容的目的並非創造一個完全虛假的人物，而是選擇性放大某一符號，將複雜事件壓縮成單一政治標籤。因此，AI時代真正需要警惕的，不只是「假的資訊」，而是「被重新安排過的真實」。

在這方面，中國、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經驗提供了一個值得觀察的區域案例。中國在AI時代的資訊影響，逐漸從單純傳播訊息轉向長期性的敘事塑造，尤其透過文化、語言與歷史記憶重新安排問題。當「華人」、「中文」、「中華文化」與現代國家身分被混合時，文化共同性可能被轉化為政治敘事工具；「母國」和「祖國」也可被暗中混淆。美籍華人文藝評論家陳丹青曾一針見血點出：「任何母語問題都是政治問題」。然而，資訊影響並非只有威權國家才存在，美國等民主社會同樣面臨平台商業模式與演算法放大極端情緒的問題，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的政治分裂和社會對立。AI資訊戰已成為全球共同挑戰。

不同的民主回應模式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則提供兩種不同的民主回應模式。新加坡長期對資訊環境採取較審慎的法治方式，《防止網路假訊息與操縱法》（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 POFMA）便建立了一套制度性的修正機制。當某些資訊被認定為

錯誤時，相關平台或發布者可被要求附加更正說明，使公眾同時看到原始內容與查核資訊。

相較之下，馬來西亞更多依靠民間社會、媒體工作者與文化創作者形成自我糾錯能力。透過幽默、諷刺、迷因與公共討論，多種族間的碰撞火花，社會自身產生反駁與修正力量。兩者代表民主社會面對AI時代的兩種必要能力：制度性的修正，以及文化性的修正。前者避免錯誤資訊無限制擴散，後者避免公共討論被單一敘事壟斷。

這也重新回到作家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與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關於民主與資訊的經典爭論。李普曼認為，現代社會高度複雜，普通公民需要依靠專業知識與媒體中介理解世界；杜威則認為，民主本身就是公共學習過程，人民應在共同討論中形成判斷。一個依賴更準確的數據和更專業的精英，一個則依賴更廣泛的民間參與和更充分的討論氛圍。但AI時代的問題是：當資訊變得無比充足時，我們是否真的更接近真相，或者只是更加依賴替我們整理世界的系統？

更重要的是挑戰答案

因此，我們需要重新思考「人工智能的主權」（AI Sovereignty）的概念。「AI主權」不是建立封閉的AI局域網，而是一個民主社會是否具有理解、監督與塑造AI的能力，確保人工智慧符合自身法律制度、文化環境與公共價值。民主國家若只是與威權國家競爭誰能生成更多內容、擁有更大資料庫，可能永遠處於被動位置。正如政治學者史蒂文・列維茨基（Steven



新加坡國會訂立防止網路假訊息與操縱法，設有一系列漸進式機制，從要求網站添加事實核查連結、對網站進行審查封鎖、直至提出刑事檢控。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採用AI人工智慧偵測器，掃描數位內容，以偵測深度偽造和真實性，避免錯誤資訊無限制擴散與敘事壟斷。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Levitsky）與丹尼爾・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所指出，現代威權力量往往並非拒絕民主制度，而是學會利用民主社會自身開放、自由與資訊流通的機制來削弱民主；相反，民主國家受到法治、權力制衡與程序正義的限制，往往難以以同樣集中化的方式進行反制。因此，民主真正的優勢並不在於複製威權模式，而在於發揮開放制度所孕育的創造力與批判性。因為AI最擅長的是規模化生產，而民主真正的優勢並不只是技術，而是創造一個能持續產生新思想、新問題與不同聲音的創意土壤。

這種創意土壤的核心，不是規模和效率，而是個體性（individuality）與批判性（criticality）。AI可以快速模仿既有模式，卻最難取代那些偏離模式、重新提出問題的能力。調查記者、學者、作家、藝術家與普通公民，共同構成民主社會的認知免疫系統。他們不只是提供答案，更重要的是挑戰答案。

對臺灣而言，面對AI時代最大的挑戰，不只是防禦境外資訊影響，也不是盲目追求技術競爭力，而是建立結合科技、民主與文化的綜合韌性體系。臺灣需要提升AI素養教育，讓公民理解AI如何生成資訊、如何受到資料限制，以及如何影響判斷。同時，也應建立透明且具公共性的AI治理制度。美國大學的AI論壇上有人提出：AI不該成為另一個狂野西部（Wild West）。

更重要的是，臺灣需要理解自身真正的優勢：多語、多元與開放的文化環境不是AI資料中的噪音，而是民主社會面對單一敘事的重要資源。真正的AI主權，不是讓所有AI說同一種話，而是讓不同聲音都有能力參與AI時代的知識生產。

回到潘恩兩百多年前的提醒，民主最危險的時刻，往往不是人民被迫接受謊言，而是人民逐漸失去懷疑的能力。今天，AI未必會摧毀民主；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當演算法開始替我們安排問題、整理答案與定義常識時，我們是否仍保有重新提問的能力。民主最珍貴的能力，從來不是擁有最多答案，而是允許人們提出新的問題。